“发展”是事实还是历史阐释

——《发展的幻象》读书笔记[[1]](#footnote-1)\*

李凌浩 20181052113

logos（λóγος）和polis（πóλις）是古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而事物的“开端”在古希腊文化价值中又有重要意义。人需要在共同体中才能够作为“人”来生活，而城邦是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在城邦共同体中的人最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政治哲学从古典发展到现代的背景是，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由历史意义上的城邦到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转变，但在学科范式和社会现实的转变和演进之外，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处理他与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相反，一种文明发展的“危机”逐渐暴露出来。

齐美尔以一种康德式的视角来说明现代性的症结：从被“神化”的货币经济着眼，现代人面对的是从文化到内在生命的紧张。这一点在其1896年见刊的小品文（essay）《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中就已提及：齐美尔将货币比作“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人是无法栖居在纯粹手段的桥上的，但现代人却将金钱视为通向所有快乐的钥匙而孜孜以求，原本导向目的中介和手段本身被当成了目的。简而言之，在现代的价值体系中，什么是一个“好”的生活，以及如何过上这样一种生活，是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问题。在《发展的幻象》所选编的沃勒斯坦、阿里基、塞林斯等思想名家的文章里，“发展”、尤其是经济和社会历史的阶段性上升趋势，很可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误读。这篇读后感意在重新回顾《发展的幻象》中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及班努里（Tariq Banuri）从世界地缘政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学科范式等方面对15、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从

# 一、“国家发展”的泡沫

沃勒斯坦将视角集中在国家、以及国家内的市场生产上。在推动国家尤其是国家经济发展和进步方式的选择上，一方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内部也各执己见，但无论如何，发展是可能的，并且是必须的。沃勒斯坦将发展定性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集体社群心理（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5。后文简称《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发展一词首先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给自己的形容，它们的地位来自于率先开始的资本主义扩张和积累进程。这种“发展”实际上指代的是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发展》，11）。

但这一体系，乃至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塑造和推广的发展“神话”正在受到冲击。被兜售的“发展”要么意味着社会主义和内部平等，要么意味着经济发展。沃勒斯坦有意描述二者之间的某种张力：从国家的角度看来，社会主义改革难以带来经济发展。因为国家发展的实际途径是地区侵占和剥削，使得积累像“溅在吸墨纸上的墨水从中心扩散开来”（《发展》，15）。沃勒斯坦认为，这一局面形成的原因来自于分配体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1945年以前被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增长抵消，但当资本主义无法再在地域上扩展时，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不得不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发展》，16）。资本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像是一个随着扩张和积累不断膨胀的泡沫，当泡沫表面的张力再也不能维系其体积的增大时，泡沫也就随之破裂了，这种破裂不是资本主义或国家本身的瓦解，而是属于欧美国家的发展范式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被轻易接受，世界各国陷入零和博弈的竞争当中。

最后，沃勒斯坦从生产环节上给出了答案：由生产者保留剩余。沃勒斯坦将世界财富天平的倾斜归咎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毫无意义的竞争。通过生产者保有剩余价值这种方式，一种带有早期市场经济色彩的发展方式取代由国家主导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商品化的过程，排斥垄断和地域地位的差别，通过生产过程的自由，保留同时推进平等和发展的可能性。沃勒斯坦认为，只有在选择这样一个平等的概念，在排除国家机器之后，发展才是“指路明灯”。

# 二、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发展理论

“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极端差异和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冲突和紧张，也让针对发展理论的学科——经济学和政治学——进入了一种“前范式”时代：当发展的理念和推动发展的实践不仅没有为世界带来想象中的繁荣，反而加剧了不平等和动乱的态势时，如何正确促进发展乃至“发展”本身的意义和价值都要重新收到审视和拷问。

“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是最常被提起的问题。在班努里看来，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植根于某种“局部的”合理性——比如人均生产力、基本需要等等，社会生活的这些方面往往能够和现代化的特征联系起来，从而为西方价值观和习惯提供进入的切口（班努里，《发展与知识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发展中的社会角色的批判诠释》，148-149，以下简称《政治》）。在班努里的描述中，虽然这种理论所兜售的“现代化”，为何会成为一种潮流或正确的原因尚不明晰，但它确实为西方化包了一层糖衣。亚、非穷国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并未带来美好生活。正因如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理论家要如何面对理论预测上的这种明显失准，而又会如何回应反体系批评者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班努里就已经采用了一种“冲击-反应”的视角来概括发展理论进化的途径乃至方式。

班努里概括了发展观从二元论到政治发展，最终历经对科学的反思和资源保护意识汇聚到文化批评上来。持“发展理论”的顾问们在这一过程中将某种普适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目标替换为了种种西方化的体征，而恰恰是这些体征带来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不适和阵痛。在发展理论学界中，具备一个“范式”意味着不断进行“常规研究”的合理化——修补理论从而让范式能够尽量自圆其说。但就发展的本土实践而言，这种修补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因为范式本身就正在面临着更迭的压力。现代化发展的本土进路不能被理性而现代化的语言代替，甚至不应该被干预，从而保有某种内在的活力——用班努里的话来说，是维持“‘人性的’和‘非人性’的两半之间的平衡”。

# 三、关于“发展”的联想

在上面的分析里，“发展”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话语。如果我们以文明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体系的扩张是垄断权力加强、社会分工细化的“文明化”进程，在一个权力垄断的庇护下，在相互依赖的密网中，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充满张力”地关联，局外人学习局内人的文明习惯，并有所改变，此时，局外人也就成为了局内人[[2]](#footnote-2)。如果今天我们所指的发展，实际上是我们被置于大规模社会时，心理过程被塑造、看与感觉方式等方面被诱导转型并建立了牢固联系，那么，理解这样的一种“发展”对我们来说就是文明化的过程，只是在这里，“文明”是一个中性词，它不必然将我们导向一个更好的生活。

班努里所说的文化乃至文明被“非人性化”，似乎可以理解成某种客体化。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就是本土文明对被西方文明客体化的拒斥。那些长久扎根于自己的文化中的人们，在试图“西方化”时总会遇到种种不适甚至阵痛，这是“非人性化”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或者是资本主义文明），天生地带有韦伯所说的“形式合理性”气质，当资本主义文明在理性指导下构建庞大而复杂的科层制组织、用专业而精准的计算衡量一切时，一些属人的因素也就被“实质非理性地”淡化了，这是“非人性”外来文化的另一个侧面。我们能够看到“非人性化”和“人性化”的两面在祈求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中的冲突，但更值得探索的问题是，本土文化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而在舍弃“西方化”之后，属于本土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如何进行这样一种现代化？我认为这是从《发展的幻象》的阅读中可以进一步引申的两个问题。

1. \* 《发展的幻象》，许宝强、汪晖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出于行文简洁和明确起见，对《发展的幻象》选编文章的引用，将直接标明文章原文标题，并标出页码，不再一一注出这部书名了。 [↑](#footnote-ref-1)
2. 史密斯，丹尼尔，2011，《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 160。 [↑](#footnote-ref-2)